



## 希拉里迷恋战争的根源

戴维·布罗维奇<sup>1</sup>

编者按：美国大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下一位美国总统将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呢？本期摘译耶鲁大学教授布罗维奇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该文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外交理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作者指出，希拉里所谓的“巧实力”不仅包括运用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等工具推动政权变更，还包括支持武装叛乱、对敌方施以网络战、经济制裁乃至军事干涉等。作者警告未来的美国总统，不应重蹈“人道主义战争”的覆辙。

**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动机的纯洁性，是政治家所能拥有的最危险的天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希拉里·克林顿曾是左翼自由派中的熟悉面孔：她在耶鲁法学院监察委员会中志愿监督对黑豹党领袖博比·西尔（Bobby Seale）判决的公正性，她参与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的华盛顿研究项目（儿童保护基金会的前身），她还参加了弹劾尼克松的法律调查工作。然而，在一件事情中，她基本上消失了，也未做过任何声明：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克林顿的一个朋友——克雷格对《纽约时报》记者马克·郎德勒（Mark Landler）说，虽然圈子里的其他人都“深深卷入”反战运动中，“我记得希拉里

---

<sup>1</sup> 戴维·布罗维奇（David Bromwich）是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roots-hillarys-infatuation-war-16787?page=show>。此为中文摘译版。

跟此事没什么关系。”希拉里在她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用两页描述了那场战争。其中，她对约翰逊总统因“继承战争”而背负重责表示同情，在她看来那场战争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tragic mistake)。对于一场永久性毁灭了一个农业文明并杀死了一到三百万越南人的战争来说，“错误”这个词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了。希拉里·克林顿在回答关于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问题时，也喜欢用“错误”这个词。

与任何一个1960年以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样，希拉里的谈话有时让人觉得她希望外交政策消失。她认为，一个总统最重要的责任，是在国内加强邻里和社区的团结，为工作的美国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并为所有人提供有效的分配体系。然而，她作为国务卿的四年时间——参见她回忆录的第二卷《艰难的选择》(*Hart Choices*)——赋予了她评论世界各国关系的权威。正如该书意在展示的那样，战争与外交已经成了她能力中无价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战争与外交之外，希拉里也希望将“巧实力”(约瑟夫·奈提出)作为她的第三件武器。对她来说，巧实力能够增加武力和外交的效果。这要依靠公民社会网络、非政府组织、民主推进项目和社交媒体管理——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一直试图运用这些方法去削弱敌人的权威，同时增加对盟国的影响力。

巧实力本应拓宽自由社会的前景，帮助扩大人权。然而这个名词自身制造了一个困境。希拉里·克林顿主张在利比亚实施暴力性的政权变更，并呼吁支持叙利亚反阿萨德的武装叛乱者，这些都是为战争辩护的论点，却被声称可以免除罪责，因为这些战争被认为是“人道主义战争”。希拉里避免使用最后这个短语，她也回避解释她对“保护的责任”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在2015年10月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她选择用“最佳巧实力”去形容利比亚战争。

在北约策划颠覆卡扎菲的行动当中，希拉里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最终变成了一场与伊拉克很相似的灾难——尽管程度要小，但后果同样严重，其影响波及北非、中东与南欧等地。战争的借口，是被夸大的卡扎菲对班加西反对势力的威胁——他宣称要像捕杀老鼠一样逐门逐户地追杀反对势力——这被认为是要对城市居民进行集体惩罚。但事实是，当时卡扎菲的大军已经从利比亚的西部到达东部，期间并没有出现屠杀——美国国防部、智库都认为屠杀的威胁并不可信。但希拉里却选择将卡扎菲的威胁解读为“种族清洗”的前兆。

在一本关于希拉里与奥巴马关系的书中，朗德勒写道：“利比亚已经陷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中”；已经成为“在非洲大陆向西向南扩散战争的温床”；“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以外最重要的据点”；“它输送了一波又一波绝望的移民，这些人跨越地中海，在看到欧洲的一刻淹死在小船里”。然而，希拉里最近说的一些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她的态度：她将继续相信巧实力的治愈能力。这种信仰看起来是真实的，而不是策略性的。

对希拉里有关巧实力的定义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许多令人困惑之处。在她的模式中，网络战可以成为对巧实力的合理运用，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兵不血刃即可损害敌方的攻击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为攻击伊朗核设施而部署的震网（Stuxnet）蠕虫病毒就是巧实力的成就呢？或者，可以考虑干扰敌对政府控制下的300万人口城市的供水或电力系统，以便激起人民不满，引发叛乱。这能被称为巧实力吗？

希拉里也清楚地了解我们在国外资助的民间组织，还有一些间接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和其他组织资助的民主促进组织。在开罗解放广场和基辅独立广场上的非暴力抗议，最终都变成了血腥的冲突。这些行动背后都有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资助——2013年12月，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在谈话中承认，1992年以来美国已经为乌克兰的民主运动提供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助。如果我们能够听到关于叙利亚内战的完整的故事，就很可能发现：美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蓄意散发的信息误导了早期“自由的”或“温和的”反对势力。

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在《完美的幻想》（*Ideal Illusions*）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权守护者的责任在不断拓宽，“从关心有良心的囚犯，到关注非战斗人员的权利，再到推动民主化，以及人道主义干涉”。这最后一个元素构成了“保护的责任”，希拉里·克林顿是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她相信——尤其是当这意味着保护女性权利或保证贫穷孩子的福利时——西方国家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干涉。她所犯的错误还没有像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所犯的那样造成悲剧，但她认为这些是偶然发生的小事，受到了太过苛刻的评判。在行动与干涉中，人们总会有犯错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军事干涉与“社区干涉”一样，可能从具有虐待倾向的家庭中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

2003 年对伊拉克的轰炸、入侵与占领，是新保守主义者为了证明其“武力投送”战略所进行的一次试验，但结果出乎预料之外。与之相对照，自由干涉主义者的试验是在科索沃，人们都认为那一次是成功的。因此，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能够在参加 2014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时的微博中写道：“今早的塞尔维亚-科索沃讨论与现在的中东讨论截然不同，在巴尔干美国愿意采取外交和武力的行动。”回想起来，为了创造一个科索沃国家，北约运用巧实力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进行了 77 天的轰炸。自由干涉主义者对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满意与赞赏是相当一致的。作为希拉里国务院中的政策规划司司长，斯劳特在北约开始轰炸利比亚三天之后给她的上司写道：“为您工作，我从未感到如此自豪。”

真实的情况是，在南斯拉夫采取军事干涉的借口与在利比亚动武的理由相差无几。在那里，种族清洗据说也在进行当中——数以万计的阿尔巴尼亚人遭到了屠杀——然而，这些报道显得荒唐离奇。在《首先，请不要伤害：人道主义干涉与南斯拉夫的毁灭》（*First Do No Har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一书中，戴维·吉布斯（David Gibbs）总结道：在北约轰炸之前有大约 2000 人被杀，然而在轰炸与后续恢复期间，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却杀了将近一万人。尽管这件事情在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但《亲历历史》一书对于它的描述却少得可怜——少于一个自然段，且散落在几个章节中。《亲历历史》出版于 2003 年，希拉里当时可能已觉察到将于 2004 年 3 月爆发的那场针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迫害的迹象——这场暴乱导致了 2016 年初的混乱状况：在首都普里什蒂纳出现了大量的帐篷，催泪弹被投掷到国会以抗议少数民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最近，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涉的后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索沃是如何变成“伊斯兰国”的沃土的》，这是 2016 年 5 月 21 日卡洛塔·加尔（Carlotta Gall）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可谓一针见血。文章的开篇语描绘了一个形象的画面：

“每周五，在距离比尔·克林顿振臂高呼的雕像仅有几码的人行道上，数百名年轻的长胡须的男人在从前是家具店的一个破烂的清真寺外跪地祈祷。”

制裁一直都是克林顿夫妇最喜爱的巧实力武器。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伊拉克是克林顿的目标，而从 2009 年开始伊朗是希拉里的敌人。制裁的关键在于招致

痛苦，以促使当地的人民责怪他们的政府，由此创造政权更迭的条件。克林顿夫妇一直都需要做些额外的工作，以显示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强硬的。对于希拉里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需求——既来源于她自身也来源于外界的压力——去证明一个女性领导者能比她的男性对手更加强硬。

朗德勒认为，如果当初是希拉里而非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么与伊朗的核协议以及与古巴外交关系的恢复都不太可能发生。2014年12月，当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关系解冻时，他说美国“想要成为能够帮助普通古巴人提升生活质量的伙伴，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自由、富裕”。相反，希拉里却警告古巴不能将这个行为误解为缓解敌意；在2015年7月访问迈阿密时，她说道：“对于卡斯特罗，这不是礼物，而是威胁。”由此，她表面上是支持奥巴马的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其中的含义。

2014年5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超级大国永不退缩》。当时，奥巴马总统显然已经不会为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与之对抗，也不会像新保守主义者渴望的那样在叙利亚推动政权变更。希拉里在《艰难的选择》中谈及北约东扩时称：

“在2014年初，由于俄罗斯非法吞并了克里米亚，有些人认为北约东扩可能导致或加剧了俄罗斯的激进行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更有说服力的是那些对能加入北约表达感激之情的欧洲领导人与人民。”

这些话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从老布什时期开始的、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得到推进、小布什和奥巴马也继承了的北约东扩，并不像希拉里所暗示的那样是一项被广泛接受的温和政策。从一开始，这项政策就面对质疑与挑战，乔治·凯南便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除了遗漏历史外，在希拉里关于北约的说法中，有一处使人困惑的逻辑跳跃。与许多西方外交人员一样，普京认为一个冷战体系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扩张是针对俄罗斯的挑衅和敌对政策——这实际上与北约新成员国表达的感激之情没有什么关系。

政治家所能拥有的最危险的天赋，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动机的纯洁性。她那些关于北约的说法很可能出自托尼·布莱尔的想法；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至少有三个新保守主义者——艾略特·科恩（Eliot A. Cohen）、麦克斯·布特（Max Boot）和罗伯特·卡根，按热情度由低到高排列——都乐见希拉里成为总统。对

他们来说，她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她将普京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她还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与苏台德的德国人进行类比。这让人想起了国务卿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对1965年越战升级的辩护——希拉里似乎要为了最值得赞美的人道主义理由而重蹈这种悲剧性的错误了。

(何婉筠摘译，归泳涛校)